

序 言

在 4 月 16 日很高興收到池田曉恩 (Eleanor J. Chee) 意想不到的電子郵件，通知我關於環球福音會 (WEC International) 計劃與池田曉恩一起出版池寧彬 2003 年的論文。無疑，這消息勾起了一些非常悲傷的回憶，但同時也燃起了內心的喜悅，因為知道寧彬的關於當代中國的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教會歷史 (1949 至 1958 年) 的學術工作將會為廣大公眾閱讀，這將使歷史學家和全球基督教會都得益。

我與池寧彬的認識可以追溯到香港剛回歸中國後不久那段時間，當時我的妻子馬婉麗博士 (Dr. Ida Maria Martinson) 是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的學院主任，而我剛在 2001 年從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路德神學院退休，卸下教授「差傳與宗教」(Missions and Religions) 的職責，正是在這個時候，陳劍光博士向我提到他考核的學生池寧彬，並請我指導他的研究，他想知道我會否樂意成為他的新導師，指導他重新撰寫他的論文，以達到學術要求，我同意仔細閱讀它，我的判斷是，他肯定表現出必要的學術底子，但他的原來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並沒有提出使之成為論文的必要問題和建議，因此，寧彬和我一同工作，開始了這個歷程。

很顯然，他已經收集了珍貴豐富的歷史資料，但史料也提出了問題。要把這些材料結合在一起，需要一個明晰的觀點，使我們能夠掌握這些材料的潛在含義和意義。因此，我們開始談論這些事情：為什

麼收集這些特定的材料？它們是否以某種方式組合在一起的，還是它們只是鬆散零碎的信息呢？那些人是你想他們熟悉這些事情，並且是為什麼？從所有這一切資料，甚麼是他們應該知道和理解，從而他們可以把這些信息以一個連貫的和有意義的方式放在一起？那麼，你要用怎樣的方式來陳明這些材料，以使它們變得有效和有用？這些都是我們談論的事情。問題是：要共享的材料是有的，但對於共享的方法卻仍是沒有的。寧彬理解這些問題並重新梳理他做過的工作，開始將資料按相關範疇和一個清晰目標重新整合在一起的工作歷程。

他用來整合所有這些材料的中心範疇就是「教會論」。當他檢視當時有份參與這基督教歷史頭一個十年的所有教會領袖所理解的教會論，他察覺他們之間在神學理解上存有極大差異，吳耀宗與趙紫宸是不同的，他們兩人與陳崇桂也是非常不同的，另一方面，王明道和倪柝聲與上述這些人的理解是離得那麼遠，以致相互交流根本是不可能的，此外，國家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解與他們所有的人又盡不相同。要將這樣的多樣性放在一起，或者，我們應該說混亂，正是寧彬為我們做的工作，他還花時間在第一章中說明1949年以前傳教士年代就有的多樣性見解。

寧彬將論文的焦點放在第一個十年，並嘗試找出當中主要參與者的意圖和行動的線索，他沒有詳細交待日後發生的事件，例如文革和教堂於1979年重新開放，又或者在當時2003年的發展趨勢。在目前的情勢下，已經有人在談論第三類教會運動，它既有別於三自愛國運動倡議，同時又有別於家庭教會（即基督徒自發群體），這第三類教會以一個全新的形式重新帶回基督教的普世連通性，例如中國學者和其他的一些海歸基督徒，以一種新的形式對信仰抱持開放態度回到中國。寧彬的研究的價值正在於不理解這第一個十年的教會論動態，這些後續階段將不能充分或正確地理解。

寧彬在他的論文中有一件事是貫徹始終的，就是不借用論文來評價好人和壞人，正如他在引言中說：「在我們的討論中，是假設了絕大部份參與推動的基督徒都是善意的。」換句話說，他不是借此機會來貶抑某一個人，即使是對那些他可能採取一個不同的立場，他仍是假定他們的意圖，無論正確與否，是帶著良好意願的，例如，他指出黨和國家雖然預期教會消亡—這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變得明顯了，



但仍試圖與教會以某種社會認可方式合作，因此，教會與國家的「求同」目標是一個初步性的目標，即使在今天仍是這樣，還是，也許它的真正意思是純粹的調適？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不願意接受「求同」，並始終如一的分離主義者，他們是否就是國家的敵人呢？他假定各方面的人都是有着積極意向。固然，將來還是要作判斷的，但這並非本書的目的。

當我在 2003 年 3 月中來到香港時，我是帶着很大的期望的。他曾在 2002 年四月在我們位於明尼蘇達州北部 Movil 湖的退休房子待了兩到三周。當其時，我們對他的論文的最後修訂工作訂下了工作細節，接着我和妻子要去中國，並打算在 2003 年 4 月 1 日返回香港，屆時會查看所有的最終修訂，從而完成寧彬的論文寫作。

我們跟一個小規模代表團來到中國，拜訪在河南省東南部信陽市的政府領導，他們將要批准中美服務促進會 (China Service Ventures) 開始在中國的工作，這是一個新成立的基督教組織，為要接觸較貧困農村地區中的兒童和青少年。雖然公開其基督教背景，中美服務促進會卻一直深受政府領導和社會各界歡迎，直到如今。在 3 月 31 日那天，我們回到香港，那天晚上我打電話到池家，池田曉恩回覆我們，寧彬剛剛進了醫院，並可能因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而不治，她還告訴我們，他已經完成了所有論文的改正，但如今沒有一起會面的機會，因此，我們只好在未能確認那些最後改正的情況下返回美國。

這個消息令人震驚，但已經沒甚麼可做的了。我們跟池田曉恩和她的兒子忠道見了面。他們都曾經在一段短時間患上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但他們康復了。他們的女兒慧玲當時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唸書，所以我們沒有見到她。當我們離開香港前往中國時，寧彬是完全健康的，但到了第二天，他就不知怎地感染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他在 2003 年 5 月 16 日離世，那天，我收到池田曉恩的一封信，上面寫著：「我以一個非常悲傷和沉重的心情跟大家分發這個消息，我最親愛的丈夫、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們兩個孩子慧玲與忠道的一位極好父親，他在今天下午香港時間 17 點 21 分離世。」那真的是個悲傷和哀悼的時刻。

我們深深感謝陳劍光博士主動接觸澳大利亞神學協會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使得協會的理事會作出這個非比尋常的批准頒

授他博士學位。在 5 月 31 日在香港的追思禮拜中，正式被澳大利亞神學協會授予博士學位，我們欣慶知道這一點，並如今再次欣慶，因為池寧彬博士的著作現在可以出版了，使得對中國教會和它無法窮盡的錯綜複雜性，以及其不可估量的機遇有一個更寬泛的理解。在一個以我們的被釘十字架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為核心的共同信仰底下，我們一起為此歡呼。

Rev. Dr. Paul Varo Martinson (馬鼎森博士 - 牧師)

2015 年 5 月 1 日

All Rights Reserved

致 謝

寧彬完成論文工作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而將他的論文出版成書也是漫長之旅。事實上，若不是因為一些親密的朋友和同事們的鼓勵，我們也許不會著手將論文出版，他們的建議是：這些資料對一些有興趣或在中國工作的人是有價值的，且可面向更廣闊的基督教群體和歷史學家們。

籌備將寧彬的論文編成為這本書着實費了相當的工夫。我們一家感激許多優秀和敬業的人對這事的幫助。我們尤其感謝包立人博士，他嫻熟的中文翻譯和編輯有着學術的深度，同時也把它帶給當代讀者們。同樣要多謝 Lynn Polling 女士，她在編輯英文版上帶來同樣的深度理解。我們也向成瑞芬女士致意，她為 2002 年的原著論文和本書提供了出色和高效的編輯。Llane Hadden 女士在英文格式方面給了很寶貴的幫助。我們感謝陳國成先生仔細的校對，盧婉儀女士、伍惠珍女士、伍惠蓮女士、李愛玲女士、陳玉玲女士和劉修信先生。

我們也感激羅惠強先生和香港環球福音會安排出版本書。

我們要衷心感謝許多人，他們鼓勵我們要為這本書奮力前進，並親歷神的美善，尤其當我們在越過痛失至親的低谷之時。我們特別感謝陳劍光博士、楊慶球博士、包立人博士和 Lynn Polling 女士。我們還要感謝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眾多的弟兄姊妹們、在全球各處的環球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一章

1949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教會： 它的本質和功能

要掌握中國基督教教會在 1949 至 1958 年間如何從教會論的角度回應政治上的轉變，我們必須先考察在 1949 年之前，西方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是如何理解教會的，本文將就各種政治的、神學的和宣教學的因素，如何導致中國人中間各種不同世界觀的衝撞作一總概述，這些衝撞既出現在中國知識份子和基督徒之間，也出現在西方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之間。對教會本質和功能的不同理解的交互作用，塑造了自基督教進入中國以來的中國教會發展。本章的目的是要凸顯形成中國教會與教會論的各種不同爭議，當中牽涉了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這兩方面，與其及這些教會論如何影響中國基督徒在 1949 至 1958 年間的重要政治轉變中作回應。

本章的範圍是考察 1949 年前各種政治和社會議題如何衝擊宣教士實踐他們對教會本質和功能的理解。在實踐過程中，宣教士給教會一差會關係上留下了一些遺產，例如：宗派主義、權力轉移，以及本色化的難題，這些都是中國基督徒在 1950 年代需要處理的。本章也會探討中國基督徒所面對的窘境，就是在西方宣教士的影響下，如何處理身兼中國人和基督徒雙重身份的內在張力。宣教士的遺產導致基督教被指控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與及中國教會內宗派分立，這些議題都是需要處理的。中國基督徒也要為他們的信仰尋找對中國社會的意義和關聯性，而這是要在國民黨時代的社會和政治情境中表述出來的。本章會討論中國基督徒如何在一個日趨腐敗的社會和政治境況

中，嘗試建立他們自己對教會本質和功能的理解。中國基督徒對1949年之前的社會和政治情勢的回應，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關於教會本質的理解，這些不同的教會論成為日後在1950年代教會論衝突的爆發點。

我們將會盡量按照歷史進程考察這各種議題，好使我們對1949年前的事情發展有一個歷史輪廓，雖然討論難免會有重疊。

直至19世紀中期中國和西方簽署條約為止，中國藉着清政府頒佈禁教皇諭和國內反基督教傳統，一直抗拒西方的傳教工作。基督教一直被視為是洋教和反儒家的異端，只會破壞中國社會的穩定。每當中國受到外來威脅時，這些仇外和反基督的情緒便一再出現。¹最終藉着「炮艦外交」和在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脅迫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基督教宣教士得以進入中國。在鴉片戰爭(1839-1842)和英法聯軍入侵(1856-1860)後簽訂的條約，使到向中國宣教的大門終於打開了。²若不是宣教士得到境外特權，他們根本不可能如此大規模地接觸到非信奉基督教的中國普羅百姓。

到了1919年，基督教內大部份具規模的西方宗派均已向中國派駐他們的傳教人員。當時總共有超過一百三十個傳教組織在中國工作，³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無損宣教士人數的增長。在1926年，那是中國宣教運動的高峰，有差不多八千名宣教士在超過一千個傳教站工作。⁴

及至1949年，從其建制地位而言，基督教已被確認為中國主要宗教之一。有接近六十二萬五千名領受聖餐會友參加各主流宗派教會，當中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循道會、浸信會和聖公會。但傳教事業常遭一些中國基督徒垢病，指它在中國教會中製造了派別和宗派對立。與此同時，在宣教士的領導下，中國基督徒之間所持的教會論之差異和多元，使得中國教會幾近不可能團結合一。

考察1949年前中國教會的發展，揭示了塑造宣教士和中國教會領袖間交往互動的一些重要的因素。這些來自不同神學背景的宣教士，以及透過宣教士和中國教會領袖之間的交往互動，模塑了中國基督教教會的形態，也支配着它在面對1949年及其後的政治社會轉變時的回應立場。在這段較早時期中浮現出來的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宣教士間互異的神學思想以及他們對教會的不同理解，另一個就是在教會執行權柄這個課題。



甲、宣教士神學思想的多元性

宣教士將一種西方式的教會理解移植到中國來，它唯一的共識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肩負起傳福音的責任。雖然對宣教士駐留中國的作用有一致見解，但對怎樣福音化中國的進路則存在着根本差異。早在 1909 年便有一批宣教士主張，宣教工作的最終目標是要徹底轉化整個中國社會，而基督徒在行動上的見證遠比傳道來得更有意義，他們宣稱那藉着改變社會狀況達到改善人類的傳教策略是仿效耶穌而來的，他們深信教會是社會和政治方面變革的媒介，這批宣教士被標籤為自由派或現代派。⁵ 相對上述的進路是另一批宣教士的取向，他們堅持宣教士的主要關注是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及訓練他們傳揚救人的福音，其他工作都是次於傳福音這個任務的。宣教士圈子裡的神學思想多元性不是一種智性活動，它也形成兩種不同範式的宣教策略，並造成各種長遠後果，影響着當時及 1949 年的中國教會狀況。

一 教育機構與社會服務

強調改變中國社會的宣教策略產生的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宣教士涉足各式各樣的救濟和社會改革工作，他們相信這些慈惠工作是基督徒愛心的表現。中國人對社會服務較諸佈道工作有更好的反應，在眾多宣教事業中，建立高等教育機構成為基督教在中國宣教工作中一個重要部份。宣教士（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宣教士）聲稱若果那些受過良好訓練的社會領袖，都是曾經在基督教中學和大學接受過教育，那麼，最終會更快速地使中國基督教化。⁶ 宣教事業中的高等教育工作的增長確實是驚人的，到 1906 年，在一些有這類規模宣教活動的城市中，合共有十四所頒授各種學位和非學位的院校教育課程。⁷

大部份這些院校都是在美國註冊並頒授美國學位，這樣將美國高等院校的課程直接轉移到中國來的做法，備受中國教育家們和中國基督教教會的批評。課程唯一不同之處就是少了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內容，此外，就是稍為刪減歐洲歷史和文學這一部份。在許多院校中，學生出席教堂禮拜是強制的，另外聖經科也是必修的，雖然也有教授中國哲學、文學、詩詞和歷史，但上課時間則較其他英語課程少，學生通常都是專注於西方學科上而忽略中文學科，一些課餘活動像田徑、戲劇和基督教青年會活動也佔據了學生不少餘閒。

差會組織這些活動的原意是好的，目的是要使全國歸信基督教，

可是在中國人眼中，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都是洋化而不屬於中國社會的，另一個受批評的原因是維持這些學校的費用相當昂貴，因此，當宣教士撤出中國時，中國基督教教會根本無力接辦。在 1920 年代後期，詹貝克會督 (Bishop James Baker) 就曾經表示過，差會將過多的資源用於辦教育上，結果犧牲了建設一個在教會和社會中紮根堅實的基督教。⁸

在社會服務方面，姑勿論宣教士是否支持全力參與社會服務的主張，但中國社會中低下階層的絕望境況是不可能視而不見的，宣教士和教會在社會服務方面相對容易地為他們自己定位，因為這方面的工作有助中國教會界定它在社會上的角色。很多宣教士以反對吸食鴉片、改善婦女地位、賑災救荒，與及建立超過一千所孤兒院作為改善中國社會的貢獻，⁹ 反對者則認為這些活動只是建基於膚淺神學的基礎上。

也有批評指向另一方的宣教士陣營。那些着重佈道工作的，被批評為思想過於狹隘，僅着眼於個人得救而對社會境況未有足夠關注，他們也被批評是敬拜聖經而非研讀它。¹⁰

宣教士的不同神學思想之間的衝撞教中國基督徒左右兩難。一些基督徒將這種情況理解為兩種基督教，一種是由宗教出發的社會關懷，另一種則着重於個人需要。¹¹ 這可理解為西方基督教的問題，但最終也波及中國教會。教會沿着這兩條不同路線發展，將會決定它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和功能。學者 David Yui 指出神學上的衝撞最終導致中國教會出現分歧，對教會要應付從世俗勢力來的挑戰是最為不利的。¹² 為了解決雙方陣營之間的矛盾，曾有主張認為要將教會辦的所有社會服務工作與其他教會事工分開，各自分頭行事；也有建議所有宣教士用半年時間從事社會服務，餘下半年則從事福音工作，這些主張似乎都未有奏效。這種衝撞延伸至差會之間的關係，並且影響着中國基督徒領袖對教會本質和功能的理解，它稍後更以另一種形式在 1950 年代重現。

二 宗派主義與中國基督教教會

另一個塑造中國教會發展方向的因素是宗派主義。為數眾多的傳教機構各自在中國工作造成的一個影響深遠的後果，就是建立了秉持各種不同宗派着重點的教會，甚至同一宗派但不同國籍的宣教士所建立的教會，在教會事務上也有差異。許多人相信基督教教會獨特的教



會治理制度和多類型性質本該是一種優勢，因為這些相異處可以滿足不同基督徒群體的需要。在這個範疇上，許多宣教士憂慮消除宗派只會引發爭議，而正正是這些爭議導致當初在西方教會產生宗派。¹³ 但宗派林立又確實對中國信徒和非信徒造成混亂，中國基督教教會缺少團結無疑是合一見證的障礙。

教會合一問題其實早於 1877 年舉行的全國宣教會議中就被題出來，會議確認宗派在中國是不應該存在的。¹⁴ 1910 年在愛丁堡舉行的首屆世界宣教大會（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上，有出席代表對中國教會的宗派主義深表不滿。中華續行委辦會在 1913 年成立，它的目的就是要處理不同差會和宣教士之間的事務，中華續行委辦會亦負責出版《中國宣教年鑒》(China Mission Yearbook)、《中華基督教會年鑒》(China Church Yearbook) 和《基督教傳教士名錄》(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這個跨差會的組織會發放宣教工作和中國教會的資訊，並探討宣教機構和教會相關的課題。

第一次基督教全國大會於 1913 年在上海舉行，大會上討論了宗派政策、宣教教育、神學教育和事工管理等事項，並且成立了一些合作機構如廣學會，還籌組了一些跨宗派組織如神學院和翻譯事工等。¹⁵ 這些都是重要的步伐，但為消除宗派主義所必須的進一步措施卻是遲緩且令人失望的。

委辦會促成的合作和協議成為一個基礎，造就了不同差會之間的對話，使不同國家差會建立卻同屬一宗派的教會也有了溝通，這為日後進一步的合作奠下墊石，因為當時大多數差會都遵守中華續行委辦會在 1917 年訂定的「君子協定」(Comity Agreement)。¹⁶ 任何差會進入一個新工作區時，必須諮詢已在該區的差會，以避免重複。¹⁷ 另外兩個重要的決議就是編輯讚美詩集和公禱書，這兩個決議對中國基督教教會的禮拜模式有着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當時中國教會很少本土創作的詩歌，一本通用的讚美詩集有助在各個教會中傳播這些數量不多的本土詩歌。

與中華續行委辦會有關連的另一個事件，就是 1919 年 12 月在上海展開的「中華歸主運動」，這運動的目的是要組織地區祈禱小組，在教會中推行識字運動，期望到 1921 年可以掃除信徒中的文盲，以及鼓勵中國信徒在一年內引領一人歸主，並透過服務和恆常捐獻以見證信仰。¹⁸ 運動在動員中國學生方面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有教會學校的傳教區內，鼓勵學生關注中國社會的需要並積極投入以解決問題。

這個運動提高了中國基督徒的自信，期間成立了中華國內佈道會，它有超過一萬名同工。這個佈道會始於滿州里，後來轉到雲南工作。¹⁹ 在 1922 年，中華續行委辦會由一個有更廣泛代表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取代，協進會的成員由各宗派組成，較前更具代表性。他們參與建立若干醫療服務和高等教育機構的計劃，因為這些事工都不是個別宗派或差會能夠在經濟上獨自承擔的。

成立基督教協進會的目的是要聯合中國的基督徒和宣教士，以實行合一精神。該組織的成立憲章指出基督的教會乃一個社會實體，而基督教福音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因為必須有外在可見的表現引證內在的轉化，教會必須認真地關注國民在物質上的福利。²⁰ 基督教協進會憲章中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它組織代表的方法，它為更多中國基督徒代表參與基督教協進會鋪路。²¹

但在實行上，基督教協進會的實質角色在 1925 年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受到了考驗。根據 1924 年出版的《中國宣教年鑒》，基督教協進會不是教會活動的主導者，它也不會推動任何政策，它只有作為諮詢機構的權力。²² 1925 年，基督教協進會呼籲西方廢除不平等條約，卻因此與一些保守的宣教士發生衝突，因為後者希望可以藉保留外國人的特權使他們的工作可以暢通無阻；而基督教協進會建議以新的條約取代不平等條約，並中止一切外國特權，只會進一步激化早已因學校立案事件鬧得沸騰的保守和自由派別的在華宣教士之間的矛盾。

基於對基督教協進會的自由神學立場和在參與政治方面的積極取態之不滿，中華內地會於 1927 年宣佈退出該組織。在這爭議之中，有一個時期，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委員會中部份西方成員被反對者指為布爾什維克的代表，並認為他們必須被逐出協進會，《教務雜誌》(China Recorder) 的主編樂靈生 (Frank Rawlinson) 的自由神學觀，可能是令到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的導火線。大部份宣教士仍然是支持不平等條約，因為這樣可以保證他們得以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日益動盪不安的中國中繼續工作。²³

當一群宣教士在 1927 年 4 月抗議基督教協進會的做法，在基督教團體中造成分化時，差會間的裂縫變得更大了。據批評者說，基督教協進會從事政治活動，並且因扭曲許多宣教士的觀點而超越了它的權責範圍。基督教協進會的執行委員會則反駁稱他們已經諮詢了有關的合作機構，只是報紙報導常常歪曲了他們的立場。在這場爭議中，可以說是兩敗俱傷，令宣教士群體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公開化，



一些直言不諱的中國基督徒領袖站在基督教協進會的一方，基督教協進會持續牽扯進中國的社會政治處境中，也在在顯示出它對社會參與的立場。

三 聯合的努力

教會宗派林立和宣教士團體在神學上的分歧，對中國人來說絕不是美好的見證。對他們來說，基督徒合一仍是一個尚待實現的教會真理。教會聯合要在三個層次上作出承擔和保持靈活，第一個層次是在同一地區內之本地教會的聯合，這看來是頗為簡單的一步，但在如何處理資助金和教會產業上的不同主張，便足以成為聯合的最大障礙，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的還有宣教士本國差會的影響和權益問題。

第二個層次上的教會聯合就是把神學取向相同的會眾群體聯合起來組成全國性的組織。這一層次上的聯合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達到，在華的長老宗在 1902 年開始討論統一他們轄下的教會，最後在 1922 年達成目標，²⁴ 組成了長老會教會總會 (General Assembly of Presbyterian Churches)。²⁵

這第二層的聯合雖然為邁向建立有活力的本色化教會踏出了正確的一步，但宗派問題仍未解決，許多中國基督徒本就不接納宗派主義。對於曾在那些「聯合」神學院中接受訓練的中國牧師來說，「聯合」這一概念自是可行的和理所當然的，但在宣教士當中，看法就很不一樣了，他們認為華人領袖仍有不足之處，而將差異這麼大的團體聯合起來是不可行的，他們認為這只會妨礙而非促進傳教工作。許多宣教士擔心消除宗派只會製造爭端，而這些爭端正正是原先形成宗派的原因。²⁶

也有許多宣教士害怕將教會轉交給中國基督徒領袖們，這些年資淺薄的華人領袖在宣教士眼中總是脆弱和容易屈從孕育他們的傳統和信念的。宣教士面對的另一個困難就是要在轉折時期，放下他們的家長心態，變成是與華人教會領袖一起工作的同工。

對宣教士和華人教會領袖而言，最富挑戰性的層次，乃是在第三層次上的聯合就是不同宗派教會的合一。1922 年，在一些早期的傳教地區和宗派教會的聯合事工中的確看到一點初步的推展，其中在廣東和閩南地區，由長老會、公理會和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成員教會聯合組成的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更成為那些努力要消除宗派人士的激勵，²⁷ 尤其在這些宗派中的大部份華人教會領袖

一力推動聯合。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和非基督教運動的壓力下，這些中國教會領袖渴望看到中國教會可以獨立自主和破除宗派界限。

1922年4月，中華基督教會在上海召開臨時總議會，²⁸ 雖然與會代表通過了臨時措施，但前後也用了五年時間才能獲得散佈全國各地的成員教會，對建議的聯合計劃表示贊同，其中最大的困難是在議決信條方面，尤其是在公開崇拜的儀式方面，一些保守派提議要按照傳統的模式，而其他人則主張崇拜儀式不應墨守成規；另外還有教會權柄的問題，也有人提倡要教會自治，這種困難最後都明智地得到處理，各成員教會接納彼此間的不同，並以愛心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²⁹

在教義方面，中華基督教會信奉一個非常保守的、且得到廣泛不同宗派接受的教義基礎。決定參加聯盟的教會亦可以在中華基督教會的教義基礎外，保留本身的傳統。這種聯合模式給予地方教會一定程度的自主和獨立表述。用這樣的進路，聯合行動有助邁向一個沒有宗派的本色化中國教會，當然仍需一段漫長時間方能讓不同成員教會解決他們之間在教義上的差異，從而達到真正的聯合。

對於許多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領袖來說，跨宗派教會的聯合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進路，也可作為在中國建立一個沒有宗派的中國教會的解決方案，這確有理由教人樂觀的，因為自1927年起，聖公宗和路德宗的教會已分別在他們本國內實行了宗派聯合，長老會和公理會也已經聯合了，浸信會和循理會也正在商討要成立聯盟和普世機構。³⁰ 宗派間的聯合過程往往是很費時的，而當時國內的社會和政治情勢亦急速變壞，而這些都不是中國教會所能控制的。

要解決聯合跨宗派教會遇到的問題並不是容易的，與此同時，教會尚要應付在教會和宗派層面上的權力轉移問題。

差會和教會在宗派立場上的分歧往往攔阻了宣教士將權力移交給中國教會，此外，對於權力轉移的步速和範圍也沒有一致的意見，這也造成了整個過程的緩慢進展。學者凌愛基在其所著的《轉變角色中的在華英國基督教宣教士：1945至1952》(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45-1952) 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除了作出「君子協定」規限不同宗派和差會之間的競爭之外，宣教士還可以再做些甚麼呢？³¹ 這種情況明顯存在於大部份宗派差會中，跨宗派差會好像中國內地會則在轉移權力過程中面對的問題相對較少，他們一般來說都是盡早訓練本地領袖，並將責任交付給他們，然後，宣教士繼續上路到他區發展事工。



乙、塑造中國基督教教會的社會和政治因素

隨着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局勢的惡化，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對中國的要求愈來愈貪得無厭，而中國知識份子則切望得見中國的現代化，在這段期間有兩個劃時代的事件發生，清楚表明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想法，一個是「五四運動」，另一個是「非基督教運動」。

一 「五四運動」與中國基督教教會

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基督教教會的發展。「五四運動」是中國人自1890年代後的二十年間，在思想上出現了改變和轉化的一個明確表述。³²由1890年代中開始，中國不再是自滿的儒家學者的家園，在接踵而至的國難面前，仍對中國文化道德的超然性懷抱安舒的自信。隨着在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滿清政府遭軍事力量強大的現代化日本打敗後，康有為在1898年就提出為國家救亡必須進行廣泛的變法。

「五四運動」的最主要訴求是要在中國建立富強的國家和社會，得以在列強環伺下生存與興盛。由西方輸入的各種哲學思潮，特別是在啟蒙時期興起的有關理性思想的著作，例如實用主義、進化論和經驗主義，這些思想因着嚴復的大量翻譯得以在中國廣泛流傳。³³

「五四運動」緣自一個懷疑主義、羅曼蒂克主義、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在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中激盪的時代，中國知識份子既要將自然法則和個人自由應用在社會重建上，自然對任何不合科學法則的社會組織和宗教體系存着敵意。1912年，有人提出一個憲法草案建議立孔教為國教，即時引起大規模的爭辯，也激化中國知識份子對宗教的批評。

「五四運動」對基督教的傳播造成深遠影響，它極化中國知識份子對宗教的態度，也間接地影響他們對基督教的態度。

其中一個對基督教的衝擊便是對「宗教自由」的討論。「宗教自由」是指人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反對宗教的自由，這一取態反映在陳獨秀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寫作和演講中，³⁴他們要取消一切宗教的主張是在1920後才發展開來的，因為他們只從宗教對建設新中國的作用這角度來看待宗教問題。

©2016 by 香港環球福音會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基督教會身份的尋索：
1949-1958年中國教會對政治轉變的回應**

作者 / 池寧彬博士

譯者 / 包立人博士

封面設計 / 啟創傳訊社

排版製作 / 啟創傳訊社

出版者 / 香港環球福音會有限公司

地址 / 香港九龍旺角砵蘭街332-334號龐堅中心12樓

電話 / +852 2388 2842

初版 / 2016年11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ISBN: 978-988-12359-2-3

©2016 by 香港環球福音會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教會將極大地影響二十一世紀基督教神學，以及全球教會的事奉和使命。因此，如果我們要有效地與他們共同努力，向全球每一個部分和每一個族群傳揚福音，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的世界觀、聖經和對大使命的解釋的歷史根源。這本書將有助於當今世代達致這樣的理解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以事奉神的國。

帕特里克·莊斯頓 (Patrick Johnstone)
環球福音會
《普世宣教手冊》(Operation World) 榮休作者

盼望這本書，不僅幫助讀者透過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這段時期中國基督教教會的劇變，更是藉著作者在這段時期的觀察與研究成果，折射現今的處境，給面前中國基督教教會的發展帶來亮光與啟迪！

盧炳照牧師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總幹事

這本書不僅令人信服地解釋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的經歷，同時也賦予理解當前和持續的中國基督教群體內不同派別之間的衝突背後之重要神學意義。

陳劍光博士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執行幹事



池寧彬博士受了上帝的感動，於1982年與妻子田曉恩一起創立了香港環球福音會及亞洲宣教師訓練學院，致力於訓練和差派華人作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池博士對亞洲信徒的教導和訓練工作一直到2003年他因受到沙士病毒的感染而離世才停下來，留下妻子曉恩、女兒慧玲和兒子忠道。

ISBN: 978-988-12359-2-3



9 789881 235923